

幸福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叶初升,冯贺霞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近年来,一批经济学家在吸收早期幸福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借助心理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将幸福问题的研究从客观层面推向主观心理层面、从抽象的理论阐释推进到精细的实证分析,并在此过程中探索幸福之源。本文以述论结合的方式梳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主观幸福问题研究对中国当今人类实践和发展问题研究的意义和启示。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幸福收入悖论;经济增长;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 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4)03-0125-05

长期以来,幸福问题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学着重关注的是收入、失业、通货膨胀等客观经济活动和经济变量的研究。自 1974 年, Easterlin 发现“幸福收入悖论”以来^[1],幸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并且,无论是其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这方面的文献都在以指数比率的速度在上升。本文以述论结合的方式梳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幸福问题经济学研究对中国当今人类实践和发展问题研究的意义和启示。

一、重返经济学的幸福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许多实证分析表明,民众的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并未得以相应的提升^[2-4]。在经济不断发展、人民收入不断提高的今天,许多人找不到幸福的感觉,“你幸福吗?”甚至成为民间广为调侃的一个话题。这一现象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经济增长偏离幸福的事实,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构成了挑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幸福被定义为效用,为了分析简便,经济学家又进一步以货币支出来度量理性最大化的效用水平,从而使收入水平与效用水平、主观幸福感取得了一种虽是间接却是正相关的逻辑关联。由此,减少贫困、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一切都源于经济长期增长。随着经济学家们对幸福对经济发展的

重要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长期被经济学束之高阁的幸福问题,重新回归到经济学的理论视野。

其实,幸福问题是人类社会古老而常新的研究论题之一,引起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的共同关注。在哲学领域,亚里士多德强调自我实现基础上的“人的健康幸福”,形成了“实现论”流派;边沁(Bentham)强调建立在人的快乐感受基础上的幸福,形成了“快乐论”流派。研究幸福的不同哲学传统,渗透到心理学领域,形成了心理学研究幸福的两大研究范式:一种是沿袭“实现论”传统的心理幸福研究范式,它重视个体实现自我的能力及其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5-6];另一种是承袭“快乐论”传统的主观幸福研究范式,它重视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与快乐^[7-8]。整体而言,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秉承“快乐论”的边沁哲学传统,像心理学研究幸福一样,强调个体对物质生活的满意度与快乐,即效用。在经济学看来,主观幸福是人们对自我生活质量进行积极的认知评价和情感评价^[9-10]。与心理学细致区分生活满意度、快乐、主观幸福感等概念有所不同的是,在经济学研究中,这些概念往往是交替使用的^[11]。

二、探究幸福之源

1974 年,美国经济学家 Easterlin 发现,在一国内部,在同一时期,富人确实比穷人更加幸福;随着时间的流逝,居民的幸福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有

收稿日期:2013-0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贫困与发展:以穷人为中心的发展经济微观分析”(12FJL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发展经济学前沿理论跟踪研究”(13JJD790020)。

作者简介:叶初升(1963-),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E-mail: yechsh@whu.edu.cn

所提升;另一方面,跨国比较研究并没有显示富国比穷国更幸福^[1]。自此,人们将幸福不随收入增长而增加的现象称为“幸福收入悖论”或“Easterlin 悖论”。并且,在随后的调查中,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这种矛盾同样存在^[12-13],从而进一步支持了“幸福收入悖论”。

自此,围绕“幸福收入悖论”,经济学展开关于幸福问题的研究。研究文献大致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其一,“幸福收入悖论”是否存在?其二,“幸福收入悖论”何以产生?其三,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各类因素对幸福感产生什么样的效应?下面对这 3 类文献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1. 是否存在“幸福收入悖论”

一些研究表明,幸福与收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Veenhoven 使用 1975 年盖洛普国家间的幸福感民意测验数据,发现各国人均 GNP 与幸福感的正相关系数高达 0.84($P < 0.01$)^[14]。他甚至据此提出了绝对幸福理论,认为人们的幸福感以基本需要为标准,不存在相对的幸福标准。Lelkes、Clark 等人的实证分析表明,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正效应更大^[15-16]。Frijters 等人根据面板数据估计了德国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表明,从 1991 年到 2001 年,原东德居民幸福感提升中的 35%到 40%的部分是由其实际收入的增长所解释的^[17]。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收入对幸福的作用是有了一定的门槛的,当收入超过一定的限度后,收入和幸福的关系就微乎其微了。比如,Robert 发现,一旦个人的收入上升到贫困线或者是“生存水准”之上,则主观幸福感主要来源于朋友带来的友谊或者是美好的家庭生活,而不是收入水平的提升,而这个最低“生存水准”应该是 10 000 美元以上的银行存款^[18]。Graham 等的研究表明,收入水平的上升虽然不能提升整个社会的居民幸福感,却能显著提升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幸福,并且收入水平较低时,绝对收入的增加能提升居民幸福感,但收入上升到一定水平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弱化^[19]。

国内学者对中国居民幸福感与收入问题的研究较多,但结论并不统一。部分研究表明,中国最近 20 年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民众生活满意度的相应提升^[2-4]。然而,刘军强等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近 10 年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十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且个人收入变量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20];罗楚亮使用中国城

乡住户调查数据,经验性地讨论了我国居民幸福感与收入的相关性,研究表明,收入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绝对收入与幸福感仍然显著正相关联^[21]。

2. “幸福收入悖论”何以产生

从现有研究文献看,经济学家主要是从社会可比性、适应性主观心理视角,破解“幸福收入悖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往往是以他所在的社群为参照系、通过社会比较过程产生的。强调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决定性作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Easterlin,他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强调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重要性,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正向变化,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反向变化,且后者的效应更大,最终导致了“幸福收入悖论”现象^[4,12]。

并且,相关实证分析进一步表明,建立在他人收入基础上的相对收入对幸福感起着决定性作用^[16,22]。Clark 等的实证结果表明,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有相同特征(比如教育、职业、居住地等)的个体作为比较对象,并且,个体工资的增加能显著提高其幸福感,但是,若同事工资亦等幅度增长,将会抵消其因工资增加带来的幸福感^[22]。Easterlin 对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表明,中国最近 20 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并未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幸福感正效应被社会整体平均收入增加所抵消^[4]。因此,在短期,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然而,在长期,经济增长对幸福感的正效应非常有限,尤其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幸福感可能出现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

国内相关研究表明,幸福感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建立在他人收入基础上的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至少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效应更大。官皓使用 2008 年北京、上海、广东的家户调查数据,研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实证分析表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相对收入地位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并且这结论同时适用于中国的城市和农村^[23]。张学志等利用 2008 年广东省成人调查数据,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的作用,与之呈倒“U”型关系,而考虑相对收入影响后,绝对收入与幸福感的正相关性不再显著^[24];何立新等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是居民不幸福的重要因素,且收入差距显著降低了低、

中低和高收入阶层的幸福感,而对中上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3]。

除了横向比较外,个体还可能会对自身的收入进行纵向比较:比较当期收入与过去收入,以及预期收入的改善状况。基于此,Graham等实证分析了当前收入与过去收入的变化、未来的预期收入以及个体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3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它们对幸福感均有显著的正效应^[19]。罗楚亮运用2002年全国城乡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收入变化预期、预期收入的满足程度所引起的^[25]。

另外,人们对重复或者连续刺激性的感受存在逐渐降低的过程,进而会削弱收入增加对幸福的积极效应^[8,26]。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具有自动适应收入水平提升的心理习惯,使得收入的增加不能大幅度提升幸福感,就像人在踏车上跑步一样,每一次形式上的前进其实都只是在原地踏步,产生“踏车效应”^[21]。Kahneman进一步将踏车效应区分为“享乐踏车”效应和“满意踏车”效应^[8]:前者是指适应能力会减少持续或重复的感觉刺激所带来的享受效果;后者则强调生活中各个领域的期望与现实的差距所决定的满意度。个体的期望收入总会高于其已经实现的收入水平,并且,收入越高,人们对未来收入的期望也会越高,因此,收入增长产生的幸福感往往低于事先预期。Frey等的研究表明,人们会通常适应新的环境,从而调整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这样,短期内,收入水平的提升能显著提高其幸福感,然而,在长期,一旦人们适应接受较高的收入水平,他们的幸福感会回落到最初的幸福水平^[26]。

3. 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效应

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究竟由哪些因素决定?各类因素对幸福感产生什么样的效应?这也是经济学研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论题之一。如果以函数关系简单表述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 $Y=f(x_1, x_2, x_3, \dots, x_n)$,那么,经济学家们不仅关注收入、相对收入、预期收入、失业、通货膨胀以及个体特征变量等解释变量对幸福感(被解释变量Y)的影响,而且,还进一步比较失业、通货膨胀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大小,试图为政策制定者在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提供事实依据。

与收入与幸福的错综复杂关系相比,失业与通货膨胀对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失业与通货膨胀显著降低了幸福感^[26,27]。Frey等认为,

失业对福祉的影响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因素,包括那些诸如离婚和分居等重要的消极因素,这是因为失业不仅给个体带来了收入损失,重要的是,失业给个体带来的心理损失,比如,失业会产生压抑与焦虑,甚至会给个体带来某种耻辱感,并且,这些心理损失对幸福感的负效应远大于收入损失对幸福感的负效应^[26]。显然,与传统经济理论的“工作给人带来负效用”的假设不同,工作能增加幸福,没有工作会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不仅包括物资方面的福利损失,更重要是失业对个体带来的心理负效用。

失业与通货膨胀对主观幸福感的负效应哪个更为显著?在相关研究中,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以及具有国家针对性的时间趋势,幸福感被认为以一种线性的方式取决于失业、通货膨胀。Frey等研究表明,失业、通货膨胀对幸福感的负效应之比是1:1.7^[26],也即,失业率增加一个百分点需要通货膨胀率降低1.7个百分点才能抵消;而Ditella等认为两种负效应之比是1:2.9^[27]。这样,传统意义上的痛苦指数赋予失业与通货膨胀相同的权重,这样会低估失业者受到的福利损失,这样的做法扭曲了事实。

另外,人口特征、社会特质(包括民主和社会条件)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9,10,28]。Veenhoven发现,在发达国家,人口特征因素,如性别、年龄、收入、教育、职业等社会人口统计变量能解释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差异的10%;社会参与因素,如有报酬的工作、参加自愿组织、家庭关系(婚姻、孩子),能解释生活满意度差异的10%;生活事件(如晋升、疾病、事故等偶发事件)能解释差异的25%;个人能力,比如,处理生活的能力、把握机遇的能力等能解释差异的30%^[28]。

三、简评与展望

从现有关于幸福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文献中,至少可以形成以下3个基本判断,从而也启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一,总体而言,经济学关于幸福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幸福收入悖论”展开并逐渐深入,但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纵向上的“幸福收入悖论”。仔细反思Easterlin的实证研究结论:在一个经济体之内的,就纵向的历时态而言,幸福未随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在一国内部,富人比穷人幸福;跨国比较研究并没有显示富国比穷国更幸福^[9,21]。从这个角度看,

迄今为止,已有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纵向方向上的“幸福收入悖论”及其解释,而对横截面上的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居民幸福感差异的研究较少。

第二,经济学对主观幸福感问题的关注重点依然是以收入为主的客观因素,对主观心理的因素关注不够。已有实证研究主要从收入、失业等客观因素及个体特征因素解释主观幸福感,忽视了情感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就可能会存在遗漏变量问题。比如一个性格乐观的个性,会拥有较多的积极情感,而这种情感独立于收入、教育等客观因素,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观幸福感,这样,就会产生遗漏变量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情感因素随着时间是不变的,那么可以用面板数据的处理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情感因素是否随着时间是恒定不变的还不清楚,并且,使用面板数据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动态方面的难题。

第三,对幸福问题的研究缺乏微观个体发展的历时分析。事实上,早期的童年经历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父辈贫困对子女的营养健康、教育、就业等方面,均产生了负面效应^[29];另一方面,父辈贫困,尤其是长期贫困,容易使子女形成消极的社会情感,如,孤僻、自卑、冷漠等负向情感,重要的是,童年时期形成的这些负向情感对其一生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30]。假如微观个体目前的教育、收入及性格等与童年经历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那么个体的童年经历自然会通过这些因素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幸福问题本身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不同的学科基于各自不同的研究目的,在不同的理论视野中通过不同的理论范式对幸福问题展开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越来越呈现交叉融合的趋势。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学者们越来越重视伦理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融入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代潮流^[6]。现代经济学对主观幸福感问题的研究,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分析局限,将主观幸福感作为个体发展的目标之一,使得对个体发展的度量跳出了传统的健康、教育及收入等客观层面,丰富了个体发展的内涵,拓展了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因此,可以说,从发展趋势看,关于幸福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似乎越来越回归到亚里士多德“实现论”哲学,越来越重视个体实现自我的能力及其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

在宏观上,主观幸福感已付诸社会实践,成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准。随着“以人为本”发

展理念的深入和完善,幸福是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检验发展的最终标准,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青睐。尤其是迪纳(Diener)于2000年,在其“主观幸福感——快乐科学与社会指标”提出的“幸福感应用的新方向——幸福指数”,大幅度促进了幸福指数的社会应用性。比如,不丹用国民幸福总值(GNH)而非国民生产总值衡量国民福利,GNH不仅强调生活质量、人民幸福和对地球的良好管理等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还鼓励大家讨论如何将利他主义、精神和道德信仰等因素与现行的经济学结合起来,以使得GNH更好地反映国民的真实福利。

在微观上,主观幸福感 also 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主观幸福感虽然是不同个体根据自身的体验报告出来的,但长期而言,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核心因素基本上是不变的,因此,主观幸福感具有相对稳定性、同一性、可比性的特征^[31],其次,从内容上看,主观幸福感既包括客观物资福利,还包括个体的认知、情感等主观福利,具备多维度的特性,再有,生物脑科学、心理学及统计学科的技术发展,为进一步准确测量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持。因此,主观幸福感为识别个体贫困,尤其是心理贫困提供了新的维度;另外,主观幸福感在衡量个体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工具性价值和内在性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A]. P DAVID, M REDER.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 [2] 田国强, 杨立岩. 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 理论与实证[J]. 经济研究, 2006(11): 4-17.
- [3] 何立新, 潘春阳. 破解中国的“Easterlin 悖论”: 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J]. 管理世界, 2011(8): 11-21.
- [4] EASTERLIN R A, MORGAN R, SWITEK M, WANG F.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Sciences, 2012, 109(25): 9775-9780.
- [5] RYFF C D, SINGER B H. The contours of positive human health [J]. Psychological Inquiry, 1998, 9(1): 1-28.
- [6] RYAN R M, DECI E L.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ist, 2001(52): 141-166.
- [7]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 95(3): 542-575.
- [8] KAHNEMAN D. Objective happiness [A]. KAHNEMAN D, DIENER E, SCHWARZ N.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 [9] VEENHOVEN R. Conditions of happiness [M]. Dordrecht:

- Kluwer Academic Press, 1984.
- [10] VEENHOVEN R. Quality-of-life in individualistic society; a comparison of 43 nations in the early 1990's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9, 48(2): 157-86.
- [11] EASTERLIN R A. Explaining happiness [J]. *Current Issue*, 2003(100): 11176-11183.
- [12] EASTERLIN R A.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995 (27): 35-47.
- [13] BLANCHFLOWER D G, OSWALD J A.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 1359-1386.
- [14] VEENHOVEN R. Is happiness relative?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1, 24(1): 1-34.
- [15] LELKES O. Tasting freedom: happiness, relig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06, 59(2): 173-94.
- [16] CLARK A E, FRIJTERS P, SHIELD M A.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8, 46(1): 95-144.
- [17] FRIJTERS P, SHIELDS M, HAIKEN-DENEW J. Money does matter! Evidence from increasing real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East Germany following reunific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3): 730-740.
- [18] ROBERT A C. Object and subject quality of life: an interactive model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0 (52): 55-72.
- [19] GRAHAM, PETTINATO. Happiness, markets and democracy: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1 (2): 237-268.
- [20] 刘军强, 熊谋林, 苏阳.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2): 82-101.
- [21] 罗楚亮.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财经研究*, 2009(11): 79-90.
- [22] CLARK A E, OSWALD A J.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6 (61): 359-381.
- [23] 官皓.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绝对水平和相对低位[J]. *南开经济研究*, 2010(5): 56-68.
- [24] 张学志, 才国伟. 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J]. *管理世界*, 2011(9): 63-71.
- [25] 罗楚亮.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J]. *经济学(季刊)*, 2006(3): 818-837.
- [26] FREY B S, STUZER A. Happiness and economics: how the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affect Well-Being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7] DITELLA R, MACCULLOCH R J, OSWALD J A. The Macroeconomics of happines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3(85): 809-827.
- [28] VEENHOVEN R. Developments in satisfaction research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6(37): 1-46.
- [29] CURRIE J.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socioeconomic status, poor health in childhood,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9 (47): 87-122.
- [30] MATTHEWS K A, GALLO L C.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athways linking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hysical health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1(62): 501-530.
- [31] EASERLIN R A.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J].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 465-484.

Economics Research on Happiness: Progress and Revelation

YE Chu-sheng, FENG He-xia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economists have absorbed the reasonable content of early happiness theory and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to expand research on happiness from objective level to subjective level and from abstract theory elaboration to empirical analysis and explore the source of happiness in this process. This paper lays out the new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manner of combining narration and argument.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happiness research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human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economic growth; research progress

(责任编辑:金会平)